

城市遗产是城市发展的宝贵资源与活水源泉

曹兵武

城市是文化多样性的辐辏中心，是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集中体现。建设现代文明城市，既包括对当下人类生产生活要素的合理安排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也包括对过去文化成就的传承借鉴，对未来发展的理性预期。

城市遗产是城市发展过去成就的表征，是市民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与精神家园的载体，为城市的持续发展注入崇德向善的韧性指南和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具体来说，城市的历史文脉是城市的记忆密码，城市的人文地理是城市的个性标识，城市的自然景观是城市的生态瑰宝，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城市发展的“文化DNA”，是孕育崇德向善精神、建设美好城市生活的宝贵资源。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将“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列为七大任务之一，凸显了文化传承对城市现代化内涵的核心支撑作用，以及现代城市建设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历史传承与创新超越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城市化的中国理念。

真正的城市现代化终将指向在全面保护利用自然与人文禀赋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与精神的丰盈充沛。在城市发展中历史文

脉与自然景观的保护不仅是留存“乡愁记忆”，更可以通过现代管理与业态、心态创新，如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城市风貌管理和有机更新、技术赋能和文旅融合等古今、民生协同手段，将历史遗产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一些历史名城的实践也表明，通过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延续城市文脉，增强城市文化认同感与凝聚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以文化软实力培育市民道德观念，推动社会文明风尚形成，的确能够实现“人民城市”的文明跃升。比如，一些城市通过保旧城、建新城，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动态平衡；一些城市通过风貌管控保持整体协调，避免“千城一面”，保持城市发展资源的多样性；一些城市在改造与发展中杜绝大拆大建，实行有机更新，使城市肌理与城市生活充满发展动能与活力。

因此，对于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来说，历史文化遗产不是包袱，而是不可替代的资源，需要我们下功夫真正做到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乌拉泊古城遗址遗产保护的思考

陈天柱

“山围芳草翠烟平，迢迢新城接旧城。行到从祠歌舞榭，绿甍銚上看棋枰。”在乌鲁木齐，有一个碧波荡漾的乌拉泊水库，是这座城市的生命之源。在水源地附近还有一座古城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乌拉泊古城遗址。

乌拉泊古城遗址是乌鲁木齐年代最久的城址，一直被冠以“唐至元时期中央政权在新疆有效治理的重要历史实证”之美名，也有学者倾向于这里是“唐代轮台城”之地。经久以来，缘于交通的阻塞和水源地的保护，乌拉泊古城在这座城市特有的山水之间，默默经历年复一年的风霜雨雪而保存完好。正如其名一样，它像一个历史年轮的泊位，默默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与古城遗址的结缘，是因为文物工作者的身份；而真正深入实地了解这座古城的历史内涵，则是因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普查中，我得以有机会深入这座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550米，东西宽约450米，外城周长约2000米，总面积约24.75万平方米的古城，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踏勘每一处遗迹，也对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遗址有了全新的认知。

在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城遗址的范围并不算小，城墙墙基保存基本完好，有瓮城、角楼和马面；内城有三个子城，每个子城的遗物也各有不同，南侧疑似有护城河痕迹。在普查测量中城墙夯层、三个子城内明显的遗迹和文化层，采集到的地面标本表明城内可能存在功能分区。南子城生活化的粗厚灰陶残片居多，西子城遗物石制磨盘和石杵较多，东子城遗留有一些建筑构件。城墙夯层的厚度有两种规格：一种厚约10厘米~12厘米，这种夯层普遍存在；一种厚约6厘米~8厘米，主要在子城的城墙之上使用，有些夯层之间还有一层明显的黏合剂痕迹，城墙夯筑所使用的土质基本一致。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西子城西侧采集到一枚“开元通宝”钱币，在东子城采集到一枚莲花纹砖残块。遗憾的是采集的钱币标本在地表，而非文化层，且第一个字模糊不清，与众人期待的“开元通宝”证据稍显不足，莲花砖的莲花纹饰也与盛唐的莲花纹略有不同。

乌拉泊古城遗址地处天山中断北麓，东临博格达峰，北邻乌鲁木齐水系，是古代的宜居之地。遗址不远处的乌拉泊水库墓地就曾发掘过一批战国至汉代的墓葬，乌拉泊村还有一处烽火台遗存。古城遗址地面残存的格局基本完整，残存的夯土墙体最高处约8米。城墙的构筑方式为夯筑，且不同区域的夯层厚薄基本一致，城址在规模和形制上是否符合唐代西域古城的基本规制，还需要更加科学地深入研究。普查工作之外，关于古城遗址的形制和年代问题，城墙的收分是一个切入点。要想找到古城遗址上限为唐代的确切证据，就必须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在文化层中找到关键证据。通过城墙的收分来计算城址是否符合唐代城址规制，必须要弄清楚城墙基址的边界。现在的城墙遗址坍塌外溢明显，显然不是实际边界，更确切的结论，还需要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的证实。因为不同形制的城墙夯土基址收分规制不同，稍有误差便会计算不准，得出的结论也就不科学。野外工作的魅力在于“身忙而心不累”，不止有遗址、遗物和标本，还有狐狸、野兔和蜥蜴。

遗址北墙东侧的马面附近，一处尚新的大地测绘点映入眼帘，测绘点附近有一处明显的房址痕迹，只不过年代不得而知。遗址内房址东侧不远处，普查过程随处可见野兔探头探脑的身影。行至南

墙处遇到了几只拦路的沙蜥，这种在新疆戈壁环境中安家落户的沙蜥似乎才是这片遗址的主人翁。文物工作者都有一颗敬畏自然的心灵，沙蜥已归草丛，野外工作总是充满未知与惊喜。午后，我在测量南子城内城墙夯土厚度时，突然与墙洞中探出的毛茸茸小狐狸近距离打了个照面。遗址虽临近城区，而狐踪兔影的插曲也足以说明眼下古城遗址的环境是一种十分理想的自然状态。

光阴流转，白驹过隙。时过半载，乌拉泊古城遗址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开启了新的发展模式。遗址开启了正式考古发掘，遗址内修筑了游客栈道，修建了研学基地、开放了展厅展览。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们期待乌拉泊古城优化顶层设计、提升展览质效、完善服务设施，成为乌鲁木齐新的一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场所。

乌拉泊古城所处的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虽为温带大陆干旱气候区，但古城所在区域为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十分丰富的绿洲地带；且古城位于乌鲁木齐南疆强风区，冬季雨雪时节漫长，这些特殊的环境因素相叠加，使得乌拉泊古城土遗址的保护面临着非常独特的挑战。土遗址的属性决定了乌拉泊古城遗址的本体保护任重而道远，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更是在遗址利用、生态环境保护 and 经济发展之间面临新的挑战。实践工作不止一次证明，土遗址类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方式不仅要遵循“最小干预”原则，更要综合考量文物本体展示利用与其所处环境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完整性。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情况下，尽可能保存文物本体现状与历史信息，真实完整保护好遗址在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的状态。这是一种在制定科学保护措施、应用合理保护材料、实施科学保护路径而不破坏遗址本身的“活化利用”，而非为了一时的经济效益而盲目开发。古城遗址的开发利用，要保护好文物，更要保护好文物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自然生态。

值得庆幸的是，古城遗址内已经开启的科学考古发掘，有利于探明地下埋藏情况，全面展示出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探索乌拉泊古城历史地位和和文化内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文化传承者，我们期待乌拉泊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更多实证遗址为“唐轮台”所在的重量级文物，也相信科学考古发掘工作能明确古城遗址的营建背景、修筑工艺和修筑时代，明确三座子城的营建顺序、城内布局和功能分区。这是我们探索源流、寻脉历史、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唐轮台引发的争论应该是在乌拉泊古城、米泉古城及昌吉古城的考古发掘之后，对比文化研究、历史资料及考古发掘成果而形成的最终文化定位，而非为了开发利用的一时之需而刻意竖起唐代诗人岑参雕像。作为文物工作者，我们理解和尊重古城遗址展示开发所做出的努力，但我们更愿意尊重“脚踏实地，铲释天书”的历史事实和考古发掘的科学成果，而非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和美好憧憬。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正如天山明月不属于一个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脉传承。浮华散尽，掩卷沉思；当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游人如织的时候，希望古城遗址上的野兔、狐狸和沙蜥依旧在这片历久弥新的古城上安居乐业、安之若素，依然如主角一般守护着它们生存的这片遗址和土地。

(作者单位：乌鲁木齐市博物馆)



银雀山、金雀山墓群省级考古遗址公园

山东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探析

苏媛

考古遗址公园是在大遗址保护的基础上，对大遗址进行保护、展示和利用的一种有效形式。“十三五”开始，各省纷纷探讨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和利用。

山东省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历程

从大遗址保护到申报创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再到创新组织评定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山东省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经历了探索、尝试、实践和创新四个阶段。

探索阶段：始于1964年—1966年山东省大遗址的“四有”工作。山东省组织文物工作队对临淄齐故城进行全面勘察、钻探和试掘，弄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基本内函。

20世纪70年代，对曲阜鲁故城开展勘探试掘。一套发端于齐故城，经鲁故城验证，以勘探试掘方式为重点的大遗址保护方法论逐渐成熟。此后，山东文物行政部门又对薛国故城、五莲丹土、阳谷景阳岗等遗址进行了勘探，为“四有”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

1991年1月，城子崖遗址、田齐王陵2号战国大墓被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开展大遗址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山东省持续积极组织开展大遗址保护工作，出台《山东省考古勘探发掘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考古工作流程；逐步完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大汶口第二次第三次发掘报告出版；洛庄汉墓、龙兴寺遗址开展考古发掘；景阳冈遗址、神通寺遗址保护规划方案陆续启动；《临淄文物考古航空遥感影像地图集》编绘出版。

尝试阶段：2005年，山东省共有临淄齐国故城、两城镇遗址、城子崖遗址、桐林遗址、大辛庄遗址、曲阜鲁国故城、长城(跨省)、大运河(跨省)列入“十一五”期间100处重要大遗址。

2010年6月，国家文物局启动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工作。山东省文物局组织齐国故城、两城镇遗址、城子崖遗址、大辛庄遗址、鲁国故城遗址等5处遗址所在地完成立项申请。同年10月，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曲阜鲁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大汶口考古遗址公园列入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自此，山东省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全面启动。

实践阶段：2011年，山东省文物局正式发布《山东省文物博物馆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以大遗址保护和重大项目为突破口，启动大型文物保护工程，建设“大遗址公园”，带动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协调发展。“大遗址保护曲阜片区”建设初具规模；曲阜鲁国故城、泰安大汶口遗址、汶上南旺分水枢纽三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基本建成并对社会开放。

“十三五”“十四五”期间，山东省文物行政部门始终高度重视考古遗址公园工作。《山东省文物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现5个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10个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对外开放的愿景，重大文物保护示范工程包括加快建设曲阜鲁国故城、大运河南旺枢纽、泰安大汶口、齐国故城、章丘城子崖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挥其示范作用，提高考古遗址的综合性保护利用水平，促进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创新阶段：2021年，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式列入《山东省文物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其中明确要求，到2025年，有20个以上的省级以上考古遗址公园对公众开放，实现16市都有考古遗址公园，并配套出台《山东省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此外还强调配合国家文化公园、国家及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大遗址保护，开展主动考古工作，阐释文物内涵和历史价值。同时，省文化和旅游厅积极组织开展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申报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3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项目3处，省级考古遗址公园12处，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立项项目13处。

山东省考古遗址公园的基本情况

区位优势：山东省国家级、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分布范围较广，全省十六个市均有考古遗址公园(含立项单位)，且文物大市的数量普遍较多，说明各市均有创建考古遗址公园的资源和意愿。

基本属性：从遗址时代看，31处考古遗址公园包含了旧石器时代至明清。其中，新石器时期遗址数量最多，为8处，秦汉时期遗址7处，夏商周时期遗址3处。此外，还有9处遗址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从遗址类型看，31处考古遗址公园包括6种类型，其中聚落遗址最多，为11处，陵墓遗址10处，城市遗址5处，建筑群遗址4处，工程遗址和手工业遗址各1处。

从遗址属性看，考古遗址公园均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31处考古遗址公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22处。从相关资源属性看，少数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多重资源属性，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旅游景区、风景名胜区、水利风景区等交叉或重合。从遗址所处的城乡区位看，31处考古遗址公园中城镇型6处，城郊型6

处，跨城镇城郊型3处，乡村型16处。

建设开放情况：从考古遗址公园的规模看，2处的公园规划面积在1000公顷以上，8处的公园规划面积在500公顷至100公顷之间，20处的公园规划面积小于100公顷。规划面积最大的为鲁国故城，达到4218公顷。31处考古遗址公园全部开放。

山东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考古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积极保护的一种有效举措，通过整体规划，明确保护和展示的重点，构建系统展示体系；通过财政投入，带动社会力量参与考古资源的保护；通过考古资源及其周边的环境整治和美化，优化周围的人居环境。

银雀山、金雀山墓群位于临沂兰山区，处于城市中心。自2018年起开始对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共发现墓葬495座，陶窑5座，井1口。墓群保护充分考虑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严格控制土地开挖深度，对墓葬进行微地形覆土保护。公园与博物馆统一规划建设，形成西侧公园、东侧博物馆，整体呈“前园后馆”的布局。

考古工作得到有序开展

随着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作为首要任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地方政府也积极推进，取得了扎实的工作成果。同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保证了遗址核心区域的边界清晰和空间稳定，为遗址的考古工作创造了条件，保证考古和研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考古遗址公园开展诸多持续的考古工作，成立或进驻专门的考古或科研机构；考古工作日渐精细，持续取得丰富的考古成果。城子崖考古遗址公园，自2013年至2023年，开展了四个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并全面开展相关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工作成果。

尧王城考古遗址公园将村小学校舍改造为考古研究中心，设置文物储藏室、修复室、研究室、工具室、档案室、会议室等，并与考古专业机构签订合作协议进行共建。

展示阐释逐步系统化

考古遗址公园强调规划先行的工作机制，重视整体规划布局，强调在明确遗址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系统构建展示阐释体系。

渭一窑址考古遗址公园核心区等参观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参观线路同窑址本体分布、工艺流程一致，供游客参观学习了解陶瓷的生产工艺，并设置完备的遗址公园参观导览标识系统。

陈庄一唐口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将遗址本体空间、文化意象、科学考古结合起来，建成由遗址本体、文化景观环境和遗址博物馆组成的特色鲜明、主题明确、齐文化元素凸显的遗址公园，实现考古遗址公园文化价值的整体保护。

区域发展辐射能力加强

考古遗址公园以遗址保护展示为核心，盘活土地资源，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了城市形象，塑造了城市品牌，推动了区域综合发展。公园创建过程中，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和居住条件；建成开放后，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就业机会。考古遗址公园逐渐成为旅游目的地，周边乡村旅游服务业得到发展。

洛庄汉王陵考古遗址公园每逢节假日都组织宣传活动，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服务活动；利用龙山书院平台，开展“穿汉服、弹古琴，龙山书院宣讲汉文化、带观众体验汉韵之美”“汉韵七夕、盛世传承”等活动。

留村古墓群考古遗址公园立足遗址保护和区域发展，立足乡村振兴，结合宁津街道“十里古乡”及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建设留村海草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示范区，以留村石墓群文化产业园为核心形成文化产业链，带动留村海草房的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改善效果明显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推动了城乡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汶上县为建设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对古压南旺湖遗址、运河河堤和河道的居民住所进行了整体搬迁，规划建设了一处17.8万平方米的多功能新型农村社区，搬迁群众全部回迁入住，实现了维护民生、改善人居环境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双赢；修建了连接重要遗产点的参观道路，聘请了文物看管员，着力营造良好的保护环境。

鱼台县为进一步提高鱼山垆堆遗址的保存环境，争取专项资金开展鱼山垆堆遗址本体抢救性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目前鱼山考古遗址公园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前来参观。

新的时代背景下，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将遗址的保护利用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考古遗址公园是政府、社会和公众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需要根据不同级别、不同类型和不同环境的考古遗址公园，在创建、管理和运营的各个阶段，解决不同的问题 and 挑战。

(作者单位：山东省古建筑保护研究院)



乌拉泊古城遗址航拍全景